

陶渊明与王维比较谈

王颖卓

(三亚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摘要] 比较陶渊明和王维隐居动因、方式以及田园诗创作的心理状态的异同，旨在深入揭示其田园诗创作中的个性特点。首先，陶渊明的“躬耕自资”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念，是诗人在不能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表现；王维的“亦官亦隐”则表现了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做人处世方面的境界格调不高。其次，陶渊明是以一种归宿感来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情，是“田家”语；而王维写田园诗是把田园当作一种寄托，一种逃避现实、转移视线的所在。是“词客”情；再次，从审美感觉上，陶渊明田园诗出于直接体验，无不给人一种纯朴而水乳交融的亲切感，王维田园诗如沈德潜云：“储王极力拟之，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①

[关键词] 陶渊明；王维；隐逸情结；创作心理；审美感觉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15) 01-058-06

陶渊明历来被视为中国“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其诗歌创作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唐代许多诗人。清人沈德潜《说诗啐语》评论说：“陶诗胸次浩然，其中有一段渊深朴茂不可到处。唐人祖述者，王右丞有其清腴，孟山人有其闲远，储太祝有其朴实，韦左司有其冲和，柳仪曹有其峻洁，皆学陶焉而得其性之所近。”^②

作为盛唐“田园”诗派领袖人物，王维虽师承陶诗之清腴，而终成唐诗一大家。但终因其隐逸情结、社会背景、人生际遇和性格修养的原因，田园诗创作给予读者的审美感觉，难以望其项背于宗师陶渊明。本文拟从隐逸情结、创作心理及审美感觉做一比较。

一、“躬耕自资”与“亦官亦隐”

同为仕宦之人，同有隐逸情结，由于生活时代、出身经历、性格情趣等不同，陶渊明和王维在隐居动因、隐居方式和隐居角色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

生活在东晋时代的陶渊明，他的祖先是开国功臣之一，祖先父辈们大部分都在朝廷上担任过官职。他从小就生活在物质条件充裕的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受典型的儒学氛围的陶冶。陶渊明曾多次出仕在朝。但是，东晋属于乱世，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矛盾错综交织，在理想与现实不相一致的情况下，他觉得自己奔波劳顿，深感官场险恶，实属“宏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几番徘徊后

[收稿日期] 2015-04-11

[作者简介] 王颖卓（1950—），女，辽宁海城人，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从事明清小说、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

的陶渊明深深地厌恶世俗官场，清楚地觉得自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归园田居》），于是决定逃禄而归耕。从此，他踏上归隐路，并坚定地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尽头。

陶渊明在动乱的社会中找不到个人的位置，他看到了自己的个性与官场的矛盾，于是希望在田园中寻找人生的真谛，因此，他的归隐是自觉的，是出于思想上的觉醒。因而他的归耕田园，蔑视利禄，就不只是外在的对荣华富贵、功业勋位的唾弃，而是内在人格的解放，“不委曲而累己”（《感士不遇赋并序》）。《归园田居》体现的是儒家文化价值观念，是诗人在不能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安贫乐道的表现。为维护个体人格尊严，陶渊明处而不仕，仕而辞官。在尘世仕途上他像被困的“池鱼”与“羁鸟”一样渴望解脱，他笔下的田园已融入了诗人的生活理想，成为生活支柱和精神寄托，足以慰藉心灵，反映了诗人对生命的珍惜与人格的崇高。因而站在田园面前，他心胸坦然由衷赞叹。陶渊明的身上反映了儒家文化对理想人格的设计，他希望“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尽心章句上）。追寻这样的生活，“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论语·雍也）。他是封建社会中正直进步的文人的典型代表。

王维却与陶渊明不同，他时而在朝，时而避隐，有时亦官亦隐，有时亦隐亦官，“身在江湖，心存魏阙”，既感到朝中扰攘，又难以与仕途绝断；既感到乡野的恬静，但又难以安心终老。陶渊明在“人境”里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归宿，而王维不行。王维所处的年代是唐代的开元盛世，国富民强。王维有才华，意气风发又踌躇满志。作为一个士大夫，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同时他又是一个比较正直的文人，对官场上的污浊很不满意。所以他只有到佛教中去寻找寄托。正如他自己的一首诗里讲到的：“平生几许伤心事，不到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年轻时看到的很多黑暗现实使他对于当时的政治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在张九龄被贬荆州长史时王维曾写下“安得舍罗

網，拂衣辭世喧。悠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菩提寺禁口号又示裴迪》）表示对官场的喧嚣和应酬的虚幻生活深感厌倦，要归向桃花源，但是他并未能马上付诸实行。

晚年他对陶渊明的做法提出批评：“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多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与魏居士书》）他对陶渊明辞官归隐行为的理解实在有些浅薄，也明确地给他与陶渊明的境界画出了一道明显的界线。

在王维看来，陶渊明落到了这种地步，纯属不识时务的结果，是小不忍而乱了大谋，即所谓“忘大守小”。按照王维的意思，那是理所当然地应该“把板屈腰”，稳坐官位，安食俸禄。对于陶渊明乞食的窘境，王维根本没有表示同情，相反却从《乞食》诗中挑出一句“叩门拙言辞”来，并毫不客气地讥讽为“屡乞而多惭”。当然，王维对陶渊明的这种评论和讥讽，其实对陶公并无损害，反倒是折射出王维自己在为人处世上的某些庸俗气来。

也是在《与魏居士书》中，王维对自己晚年的生有个评语——“偷禄苟活”。这个评语虽带有自嘲和自谦的味道，却也反映了一定的实际情况。的确，王维在为人处世上有时是有点过于“识时务”了。这与他名维字摩诘，人称诗佛的形象成了反差。

官场上的敷衍应酬有时是在所难免的，但其中却有个分寸和节操的问题。奸相李林甫把持朝政，作恶多端，王维虽然对他也很不满，却写了奉承李的谀诗《和仆射晋公扈从温汤》，赞美李林甫“上宰无为化，明时太古同”。同样是诗人，杜甫对于玄宗的穷兵黩武写下了充满批判精神的《兵车行》，王维却写下了极尽赞美之词的《贺神兵助取石堡城表》。对于官场浊流，王维虽也厌倦，甚至在《早秋山中作》中说“却嫌陶令去官迟”，似乎归隐的决心比陶渊明还大，但终究只是说说而已，晚年居辋川，亦官亦隐，日子过得那是相当的

舒服。安史之乱是历史上一场祸国殃民的大动乱，王维没有顶住安禄山的压力，在他那里任了伪职。虽然不是出于他的本意，任伪职期也未做什么坏事，但毕竟还是不光彩的，如果拿来与冒死参加平叛的颜真卿相比，他就显得渺小了。大概自感愧疚吧，他回到朝廷被赦后便请求“出家修道”，“奉佛报恩”。此举，才真正与他的名字相符合了。

从以上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出，他在《与魏居士书》中讥讽陶渊明以及所表露出的那种庸俗观点，并非偶然。遗憾之余，不免为王维在做人处世方面的格调不高而惋惜。

陶之辞官，实际上是不违背自己的本性而做出的选择。诗人几乎终身与贫困相伴，晚年的陶渊明，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登上巅峰，但是他的生活却越发艰难，有时甚至穷到了讨乞的程度：“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遣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到辄倾杯；情欣新知观，言咏遂赋诗。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韩才，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乞食》）“饥来驱我去”的“驱”字写尽了自己身不由己的苦衷，不愿乞讨可又不得不乞讨的无奈。然而诗人并没有因为饥至乞食而呼天抢地，当主人用酒饭使他饱餐了一顿以后，他便全然忘记了自己眼前的处境，忘记了明天等着他的饥饿，竟然快乐地与主人“谈谐终日夕”，觞酌之际还不禁赋起诗来。这种心境的清旷和冲和确是少见。

然而，即使在最困难的日子里，陶渊明再次义无反顾地拒绝朝廷的征召，躲避政治，远离官场。此时的田园诗中，更多的是带有一份感慨，对艰辛生活的无奈，同时再次表明对归隐不仕的决心。生活的酸甜苦辣使陶诗更有质感，更有内涵。陶渊明不论是他的作品，还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从古至今都被人们所铭记。陶渊明归隐田园，是对官场所谓正人君子和追名逐利之徒的反动。

他的躬耕田野，放下了读书人的架子，撕下了中国士人的脸面，心安理得地享受田园风光。当然，为了生存，他也不得不亲身耕作，饱尝了农耕

的辛酸。他用生命体验着贫困，由此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诗歌则是其生命体验和文化底蕴的综合体。并由此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田园诗派的开山鼻祖，其中农耕主题是最突出贡献。

反观王维，他不能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所以他不得不写大量的应制诗。他的“身心相离”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一方面，他想为自己的思想行为找到理论根据。另一方面，又企图从佛学中获得精神上的安慰。从这个角度来讲，王维所作的田园诗与陶渊明的田园诗不啻是天渊之别。

二、“田家”与“词客”

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以及他对社会生活的态度，对他作品的思想内容有直接的重要的影响。陶渊明的田园诗和王维田园诗在思想内容上的异同就是这点最好的证明。

既然田园是陶渊明的家园，而只是王维的别业。那么，用“田家”与“词客”这两个名词来分别代表陶渊明与王维田园诗的写作心态，也许是较为恰当的。这不仅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中的自我定位，也是他们的诗歌风格以至创作意图方面在诗歌中显著的体现。

陶渊明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里这样写道：“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诗里写到劳动的艰辛，写到一天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时得到的快慰，写出农民普遍的感受，都很真切。“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写出一个从仕途归隐躬耕的诗人的特殊感受。《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之二“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扉，聊为垄亩民。”又写出身为“垄亩民”劳动结束后与农民结伴回家，持酒劳问近邻的舒心自在的感受。

《归园田居》五首既写自身甘苦，又写了农民生活与友谊。“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其三）美好的月夜归耕图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

豪。这是在王维诗里难以找到的。“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余。一世弃朝市，此语真不虚。”（《归园田居》其四）“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日入室中，荆薪代明烛。欢来苦夕短，已复至天旭。”（《归园田居》其五）邱嘉惠在《东山草堂陶诗笺》中说：“前者悲死者，此首念生者。以死者不复还，而生者可共乐也。”((清)邱嘉惠.东山草堂陶诗笺)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在与世族社会相对立的理想田园世界中，他终于发现了自己人格的尊严，朋友的挚情，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的人际关系，无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的人生理想。这是陶诗思想意义的集中反映，也是陶诗平实，质朴，清新，自然风格的源泉。

李泽厚曾评《归园田居》：“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的描绘自然，却只有通过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才可能达到。”^[3]

“陶渊明即以‘自然’为美，他的人生理想和文学理想当然是这样的，他要的是自然的人生，自然的文学，也就是美的人生，美的文学。”^[3]当然这也是基于他的“田家”的朴素的人生观。

试看王维的《春中田园作》学取陶诗淳浑清腴的意象，描绘农田村舍，表现悠然自得的情致，就确实形似而神异：“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诗中写在风和日丽中，人们持斧伐柯，挥镐掘井。但既不见劳作者的辛苦，也与劳作者无来往。诗中所写不过是春游所见，人忙、鸟鸣、花白都同样赏心悦目，诗人作为旁观者举杯欲饮，忽而想的竟是远行之人。这首诗描画清丽的田园风光、畅述赏心悦目的农家之乐，表现了诗人闲散安逸的隐居生活的情趣。但终因无躬亲之行，不免觉得意浅，有过客之嫌。

鲁迅说过，魏晋人表面上文章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有无比的痛苦和恐惧。隐居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两面，现实生活的束缚制约着他们的归隐情怀，使之很难达到心与身同“隐”的境界。而陶渊

明却能做到真“隐”，这与他喜爱自然、向往自然的情愫是分不开的。对于自然的一切，陶渊明都是用自己的真心去热爱，把一切的思绪寄托于田园，并享受着委运自然的过程。

而王维不同，他更多的是因失意、失志而产生退隐之志。时机一到，他还是会很快“解薜登天朝”（《留别山中温古上人兄并示舍弟绪》），入朝为官的。他的隐居是一种权宜之计。这同样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个人情性有关。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不可能像陶渊明那样静静地守着自己的田园过日子。空前的盛世激发了他们莫大的雄心壮志，王维自然也不能例外。他的归隐是一种无奈的归隐，是一种手段。他几次隐居都是以再次出仕为结局。对于早期的王维，田园山水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失意时的寄托，得意时的玩赏对象，不可能完全占据他的心灵世界。很多像他一样的诗人和士人都借用山水田园景色来抚慰自己的心灵，吟咏山水，留连风物，互相唱和。一般采用“亦官亦隐”^[4]、借宿隐者“山居”或过访友人“田庄”以及在作者自己闲居庄园这三种形式，王维的田园诗创作恰好全部包涵了这三种情况。诗人当时的环境和社会条件决定了他吟咏田园的诗歌角色：以“游客”的身份介入田园诗的创作。王维则对自己作出这样的评价：“老来懒赋诗，惟有老相随。宿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世人知。名字本皆是，此心还不知。”（《偶然作六首》）他以“词客”自居，与那个时代也是有关的。

清代施补华“摩挲五言古，雅淡之中，别饶华气，故其人清贵；盖山泽间仪态，非山泽间性情也。”这句话揭示了王维诗与陶渊明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形似而神非。相比陶渊明亲身参与农务农活，王维更多倾向于欣赏，他的这些田园诗写得很美很潇洒，完全是一种闲散高雅的高人逸士的味道。

从陶渊明与王维写田园诗的心理状态来作比较，陶渊明是以一种归宿感来描写自己的生活和感情，描写周围的父老乡亲。他的心境是平和亲切

的，他的田园诗中处处有自我的存在，他便是农事的参与者与耕作者；而王维写田园诗是把田园当作一种寄托，一种逃避现实、转移视线的所在，是一种寄托而不是一种对当时自己生活情味的真实的叙述，在农村他只不过是个欣赏者与旁观者。

王维虽然常驻辋川山中，但是他却与农民隔膜，也与农事疏离。他写了十余首田园诗，虽景色优美，充满画意，但是态度却是君临其上，超然物外的。试看他的名篇《渭川田家》：“斜阳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雉雊麦苗秀，蚕眠桑叶稀。田夫荷锄至，相见语依依。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诗中也写了农家的野老、牧童、牛羊、野雉、桑蚕，写了一个恬静和谐的境界，但是诗人却是一个袖手的旁观者，眼前景物不过是他览阅的对象“即此羡闲逸，怅然吟式微”只不过是不事农桑的文士触景生情的感慨，那油然而生的惆怅也完全是个人的，与野老、牧童并不相通。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陶渊明是田园生活的参与者，王维是田园生活的旁观者；陶渊明歌咏田园写出了自己的甘苦和理想，王维抒写园田融入的是自身的雅兴和苦闷。故王维以下千余年，山水田园诗车载斗量，如摩诘者大可指数，而如渊明者则无一人，究其原因，与士大夫或者说读书人鄙视劳作，远离实践有很大的关系，亦是两人写田园诗情怀不同的因素所致。

三、“厚处朴处”与“终似微隔”

陶渊明、王维虽然都为隐者，都有“自在”的神态，但时代不同，隐逸情结、生活境遇、创作心理不同，故其田园诗给予读者的审美感受也不一样。难怪沈德潜读罢《归园田居》感叹道：“储王极力拟之，然终似微隔，厚处朴处不能到也。”
(清·施补华撰：屹唐说诗)

沈德潜说“隔”，“隔”在哪里？就在陶乃田园的局内人，王则是田园的局外客。因为无真情实

感，所以王维就怎么也“拟”不出陶渊明的“朴”和“厚”来。

我们读着“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似乎看见初夏之际，草木繁茂，微雨东来，和风拂煦，诗人与鸟都自得其乐，自寻其趣。耕作之余，诗人悠闲读书。情调显得是那样安雅清闲，自然平和，体现出世间万物、包括诗人自身各得其所之妙。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归园田居·其三》)再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这些美好的诗句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诗句集中表现出诗人摆脱世俗名利之后的悠然自得，是心灵自由之后真正快乐的自然流露，也是他同类诗篇的意蕴所在。

即便是诗人家况日下，耕作劳苦，生活艰辛，诗歌情调由轻松渐为沉重的情况下，陶诗中的“厚处朴处”“依然如此，我们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这首诗可以深刻体会到。明人谭元春在《古诗归》中评此诗“无一字不怡然自得”。

这首诗写的既不是参加农事的感想，也不是描写具体的劳动。诗中着重写的是诗人对这次秋收的期望和兴奋之情。诗人自归田以来，已经度过了十二年的躬耕生活。“贫居依稼穡，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其劳作是勤苦的，生活是贫困的，但诗人却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与安慰，这首诗就着重表现了这种他没有辜负心所寄托的情怀。这首诗中反映了某些只有亲自参加过农事的人才能体验到的思想感情。这不但在文学史上其他作家那里很难见到，就是在陶诗中亦较罕见。

他虽然很贫困，但他享受着丰收的喜悦，享受着荒无人迹的孤独，享受着幽静安闲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兴致，陶渊明没有因姿容和年龄的老去而衰减，并将这一切谦逊地归功于隐士荷蓀翁榜样的力量。“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蓀翁，

聊得从君栖。”此诗写作者之急于收获，也正是写其贫穷之状，但诗中几乎没有一点寒苦之语，只是以“饥者欢初饱”等语，强烈地感染读者。“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两句，深刻地写出了作者当时急切地盼望着这次收获的心情。所以明代钟惺评此二句说：“非惯穷不知此趣”。（《古诗归》卷九）“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等句，看似写景，轻松，乐观，却更突出了饥寒的苦辛。实际是写田地距家遥远，而诗人赶到那里，天还没亮，在他眼前的还是个幽暗荒凉的山谷，四顾无人，但闻风声和啼猿。到天亮，鸟出林飞翔之时，诗人早已在那里等待着收割庄稼。再看《晋书·五行志》的记载，义熙十二年以前，几乎连遭灾荒，从义熙六年至十一年，几乎每年春天都闹水灾，而秋冬大旱，这不能不严重影响陶渊明的收成和生活。他好不容易盼到秋收，所以几乎坐以待旦。更可贵的则是作者的胸怀放达，虽然饥寒，却仍以古代隐士——《论语》中的荷蓀丈人自比，显出了不戚戚于贫贱的可贵风格。这说明陶渊明的诗所以超越当时许多作家，不仅是由于他有杰出的才华，更和他人格的高尚有关。

不难想象，陶渊明选择躬耕的另类行为，在当时会遭遇士林的嘲讽及有悖先师遗训的批评，还得忍受耕不救穷的煎熬。因此，陶渊明选择躬耕作为自己的生存方式，坚持归于自然的信念，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袁行霈在《陶渊明研究》中专门写了关于陶渊明的农耕，说他亲自参与耕种写出来的诗

文是极为真切的，没有丝毫的无病呻吟，就像他的为人一样率真。还说，“《诗经》中有农事诗，那是农夫们一边劳动一边歌唱。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诗写出农耕中的体验，陶渊明是第一位。”^[5]

从审美感觉上，陶诗出于直接体验，生活与诗，诗与生活，无不给人一种纯朴而水乳交融的亲切感。陶渊明的田园诗言辞朴素亲切，平易近人，更多体现出返璞归真的生活气息；王维的田园诗虽充满画意，景色优美，则分明是一种局外的，旁观的，缺少陶诗那种亲切感的闲适清淡。

总之，陶渊明和王维各自以其杰作奠定了田园诗自然、素朴、简洁、含蓄风格的主流地位，涵育出田园诗注重神韵美、意境美的艺术品味，但因其隐逸情结、创作心理、性格修养以及时代的不同，带给读者的审美感受就有所差异。品读其诗作，让我们感受到两位诗人心境的不同，带给我们说不尽的心灵深处的情结。

【参考文献】

- [1](清)沈德潜.古诗源[M].民国商务印书馆，1911.
- [2](清)沈德潜诗文集(七十八)[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 [3]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
- [4]王志清.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J].北方论丛，2004,(3).
- [5]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00.